

## 一、导 言

客家是汉族的民系之一，系出中原。据英国 BBC 国家电视台估计，分布于全球的客家人约有一亿二千万<sup>①</sup>，因之有人说：“凡有日光之处 皆可遇客家人。”<sup>②</sup>在海外华侨中，客家人占绝大多数，故原国际劳工局人力经济处副处长、联合国之经济组织经济专员黄开禄教授称，“我颇相信尚未有正确统计的一件事实：在中国大陆梅州五属目前人口（假定其全属客家话系统的客家人），恐少于在海外（包括台湾）的客家人。”<sup>③</sup>黄开禄教授之说不无道理。就以黄提及的台湾的客家人为例，据台湾有关户籍调查资料统计，仅广东梅州市所属的蕉岭籍台胞就有四十万人，超过今纯客家人聚居地的蕉岭全县二十万人口的一倍。<sup>④</sup>在现今香港总人口中，客家人亦竟占三分之一强，逾二百万之众。<sup>⑤</sup>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占海外华侨绝大多数的客属同胞，在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中，起着愈益重大的作用，因而引起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

在学术界再次兴起“客家热”，“客家学”也由是进一步趋于完善。何谓“客家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香港崇正总会会长兼理事长黄石华先生认为，“‘客家学’对客家民系研究，应该运用科学方法和观点，系统地研究客家族群的历史源流、组织、现状和发展规律，推及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民俗、文化，以及族群心理、感情、意识的发生、演变，指出该族群发展的规律，并以科学方法预测其未来趋势。同时，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科学的角度，做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探讨客家族群与整个汉族及华夏传统的关系，分析客家人族群性于人类文化的意义，进而以科学论证客家族群对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所做的贡献。”黄石华教授强调：“本人更认为，‘客家学’应该是以民族学理论为基础，并融汇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的科学，较民族学具有更多的个性特征，内容更丰富的科学。”他主张：“今天吾人为建立‘客家学’，必须做整体的、有计划资料蒐集。”他说：“这是‘客家学’的基本工程。”<sup>⑥</sup>

应该说，黄石华教授对“客家学”的界定是正确的，对这门新兴学科的架构也是完整的。上引黄石华教授对“客家学”的阐述，泰国《星暹日报》、《中华日报》及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等均在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二日以大篇幅刊登，香港著名史家王赓武、金耀基等教授亦深表赞同。

中国人口迁移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客家先民及其后裔的迁徙，又是中国人口迁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应深入研究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客家民谣唱道：“客家先民，你从何方来？客家人，你又往何处去？”考客家民系的母系——汉族的初基，最先实在黄河上游两岸，后才渐进于人们所称的中原即中、下游地区。<sup>⑦</sup>为避战乱和灾荒，或为统治者的强制迁移，<sup>⑧</sup>客家先民历尽艰辛，筚路蓝缕，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自中原而最终定居闽、粤、赣边山区，于明清时期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民系——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为求生存和发展，又有许多人播迁海内外。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活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广大的社会区域，从而成为汉民族的一支人口众多、分布甚广、英才辈出的特殊民系。这样的民系在世界上是不多的。”<sup>⑨</sup>

翻开中国的古代、近现代及文化、民族、建筑、民俗、华侨等史册，不难发现，凡此均与客家先民及其后裔有关。

早在六千多年前，客家先民就聚居在古黄河道中、下游地区——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一带，他们为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拓、奠基、发展曾做出巨大贡献。据史料记载，迄西晋，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犹在中原。<sup>⑩</sup>古史称，秦人据关中之地——渭水流域，以成富强之业。其时，中国最富庶之区域，厥唯关中。秦汉之际，

引泾、渭之水，作郑、白二渠。溉田四五万顷。故太史公司马迁有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sup>⑪</sup>再以历史人物为例，西晋时尝有“豫州人士常半天下”之语。豫州，即今河南。据丁文江统计，东汉时，河南全省的历史人物，占其时全国的历史人物总数百分之三十七，而江、浙二省的合计仅百分之六。<sup>⑫</sup>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后经西晋末永嘉之乱、唐中叶安史之乱及北宋末靖康之难等丧乱，以客家先民为主的中原人民一批批大量南迁，使中国的人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仅此就可看出：客家先民南迁对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几乎都与客家人有关联。如：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由客家人洪秀全等发动并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也是由客家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和领导的，香港崇正总会首任会长、客家人赖际熙亦系“公车上书”的一员。孙中山创立和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其成员中客家人亦为数不少。庚子（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就是在客家人聚居地发生，并由客家人郑士良发动和指挥的，起义军也基本上是由客家人组成。他如丙午（1906年）萍浏醴起义、丁未（1907年）黄冈起义、丁未（1907年）惠州七女湖起义、丁未（1907年）钦廉防城起义、丁未（1907年）镇南关起义、戊申（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戊申（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辛亥（1911

年)广州起义及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客家人均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海外客属侨胞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上述起义,纷纷慷慨解囊,<sup>⑬</sup>不少人甚至回国直接参加战斗,有些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以上不难看出,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客家人曾做出巨大的贡献。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客家人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纯客家人聚居的闽、粤、赣边山区,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央苏区的所在地,是五次反“围剿”的战场。客家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勇于牺牲自我,仅以当时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兴国为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县二十三万人口,参军参战的达八万余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二万三千余名,董必武主席的诗中对此曾予以赞扬,说:“兴国男儿无敌手,井冈旗帜有文章。”聂荣臻元帅为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题词说:“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兴国人民贡献殊多,牺牲很大,对兴国的革命先烈更值得我们不忘。”<sup>⑭</sup>仅举此一例,就可窥见客家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之密切。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可回避的课题——土、客籍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闽、粤、赣边“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他说,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

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受占领平地的土籍压迫，素无政治权利。1926年和1927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在中央苏区，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1926年至1927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1927年6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9月土豪劣绅带领朱培德的部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毛泽东主席还说：这种土、客籍的界限，从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10月，11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毛泽东主席强调，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sup>⑮</sup>

显然，由于历史遗留的土、客界限，往往造成土、客籍人民之间的不团结，反映到共产党内，便是时常引起无谓的争斗，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今天，我们研究革命史中这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对于

增强客家人与广府、福佬等民系的人民及客家人内部的团结，客家人与畲族、黎族等其他民族的团结，促进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闽、粤、赣边各市县，常见的传统客家居民建筑土楼和围龙屋，在中国的和世界的建筑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位置。

土楼，主要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土楼，以闽西永定县湖坑乡的“承启楼”规模最大，直径达 73 米，全楼共有三圈环形围楼，外高内低，最外一环周长 229 米，高 12.4 米，楼高四层，每层有大、小房间 72 个，共 228 间。第二环为一层楼，40 个房间。第三环单层，有房间 32 个，中心是存放历代祖宗牌位的祠堂，外圆内八角大厅，前有天台，边有荫廊，结构极精巧。楼内有两眼深水井，可供楼内全体居民饮用。另外，永定县还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圆形土楼“振成楼”。它是按八卦图建造的，有内、外两环，外环高四层，每层有房 48 间；内环高二层；楼内有学校和古朴典雅的书斋、花园。其存放历代祖宗牌位的祠堂有一座戏台，每当演戏时，楼内全体居民数百人可在戏台前的天井里和内环二楼廊道上观看，犹如在外国的古代竞技场或大戏院包厢里观看演出。至于方形土楼，亦以永定县高陂乡的“遗经楼”规模最大，楼高 16 米，五层；中间是方形天井，用于采光，流通空气和接排雨水。天井内亦有水井。

围龙屋，一般建于较开阔的丘陵坡地或田畴中，以南北子午线为中轴，左右对称，大门前面的禾坪和半圆形池塘，恰与祠堂及后面的半圆形围屋组成一个太极圈。围龙屋，以粤东蕉岭县广福乡的罗氏围龙屋为规模最大，分内外三围，共有大小房间 300 余个，分别作为 50 住户的厨房、卧室、仓库、杂物间、厩棚、碓房和厕所。围龙屋之间的一条条天井，多用鹅卵石铺成，适于晴天晒物，雨天排水，通风采光，还起着防火隔离的作用。<sup>⑩</sup>

上述设计新颖、结构合理、极具古黄河流域建筑文化特色的土楼和围龙屋，实为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奇葩。198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史蒂文斯·安德烈参观永定土楼后写道：“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农村）建筑模式。”1986 年 4 月，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上，福建永定县的“振城楼”与北京的天坛等古建筑模型一起展出，令观众叹为观止。同年，中国邮电部发行的“中国民居”邮票，其中一枚“福建民居”，便是以圆形土楼为代表。关于对围龙屋的评价，从两位美国友人之说可见一斑。1985 年美国文学家奥斯汀女士参观粤东地区的围龙屋后写道：“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得意的中国式民居建筑。”美国社会学家曼尔参观了围龙屋后也说：“如果我要建房子，我就要建一座客家围龙屋。”还有人说：“迄今在江西、福建、粤东仍然随处可见的客家古老屋邨‘围龙屋’，是除客家地区之外见不到的。这种屋邨形式是中原贵族的屋邨形式。……这些客家屋

邨，除各种地方名字外，以姓氏而称之为‘张屋’、‘李屋’、‘刘屋’等。一个屋邨一般只有一个姓，祖祖辈辈十几代共处一屋邨。”<sup>①7</sup>确实，凡此带有历史痕迹的围龙屋和土楼，是客家人的天才发明创造及智慧的结晶，系中国的和世界的建筑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超大型的生土建筑群土楼和围龙屋，还反映了客家族群的源流、组织、现状、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心理和观念。从秦代开始，居住在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客家先民，一批又一批向南迁徙，最后定居在闽、粤、赣边山区。在由北而南的迁移过程中，为了克服种种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必须依靠血缘家族团结的力量，协调整个家族的行动。初到闽、粤、赣边山区时，这里的状况是：丛山峻岭，天荒地老，交通阻塞，土地荒芜，聚居着生产和生活方式均极端落后的少数民族。《临汀汇考》记述地处闽西的汀州的情形是：“汀，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蛋雨中。”“郡之北，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当造治之初，凡砍大树千余，树皆山都所居，天远地荒，又足妖怪，獠狃如是，几疑非人所居”粤东和粤北的状况，被贬谪到潮州的韩愈如是说：“（潮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sup>①8</sup>至于赣南，据《太平寰宇记》载：“大山穷谷之间有山都人，不知其源绪所出，发长五寸而不能结，裸身，见人便走避之，种类甚疏少，旷时一见，然自有男女焉。”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

环境和社会状况，举族而来的客家先民，抵达定居地后，仍需恃家族的整体力量，方能抵御愚昧野蛮的土著的袭击，战胜自然灾害和获得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因之在定居地，客家先民及其后裔乃举族占有土地，聚居在一个自然村落，从而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依托，有高度凝聚力的家族制。这种家族制，保留了中原土族制——数代同堂——的某些外部特征。如在土楼或围龙屋的大门上标“颖川堂”“南阳堂”等便是。有的还在门楼的匾额上标“荥阳衍派”“汝南世家”“渤海传泽”“颖川流芳”等，以显示其家族的渊源流派及表达对中原故土的眷恋，同时又向族人强调家族血缘关系的观念，以求家族内部的团结，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sup>⑨</sup>上述现象，不仅在今国内所有客家人聚居地，就是在台湾、香港及东南亚乃至全球各地客家人聚居区均随处可见，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仅由此一例，可窥客家与社会学关系密切之一斑。

客家在华侨史中的重要地位亦系众所周知的。人们常说，客家人有三多，其中之一是华侨多。客家人几乎到处都起“开荒牛”的作用，哪里可开发，就到哪里去。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武王时就有华人移居海外，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移居海外的华人更多，主要定居东南亚各国。近代以还，海外移民则达到空前程度，华人的足迹开始遍布世界各地，而在这些移居海外的华人中，客家人则占绝大多数。

著名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专家张其昀曾指出：“凡一地人口密度达饱和点时，必有移民。我国移民最盛之区域有二：一为福建之厦门与广东之汕头一带，即南洋华侨之出发地；一为山东半岛，即满蒙移民之出发地。”<sup>②③</sup>考从厦门和汕头出发赴南洋的华侨，基本上是闽西南汀、漳两州及粤东嘉应州所属之客家人。究其因由，主要是闽、粤两省，尤其是闽西南和粤东山区的人口迅猛增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急剧减少。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1753 年—1812 年，广东人口由 3969248 人增至 19174030 人；福建人口由 4710339 人增至 14779158 人。然而，上述两省的耕地面积却一直分别停留在 3300 万亩和 1400 万亩的水平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均有所减少，广东从 8.28 亩减至 1.67 亩，福建由 2.72 亩减至 0.98 亩。<sup>④</sup>从 1851—1887 年，广东人口由 2838 万增至 2976 万，福建人口由 2009 万增至 2474 万，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又有所减少。<sup>⑤</sup>除上述原因外，还有是明、清时期乃至近代，闽、粤两省自然灾害频仍，人民生活状况恶化，致使毗邻厦门、汕头的闽西南和粤东地区的客家人纷纷移居海外。如“粤东生齿过繁，久有人满之患，三十年来，谋生海外者，其数已逾百万”。<sup>⑥</sup>

到海外谋生的粤东客家人基本上均系从汕头出发。据有关史料记载，仅在 1876—1898 年，从此地往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就达 1512020 人；往德里的也几乎全是由此地出境。在这些华人中，绝大多数系客家人。<sup>⑦</sup>

在南洋群岛的华侨中，闽西南和粤东两地区的客属

人士亦占多数。<sup>②⑤</sup>客家人是最早登陆新加坡的华人移民之一。<sup>②⑥</sup>在泰国，移居此地的粤东客家人，经商者占十之三，耕田者占十之五，驶船、伐木、捕鱼、开垦、筑铁路及各种劳力工作，约占十之二，故在泰国全境的穷乡僻港，山深林密之处，皆有他们的足迹。因之有史学家断言：“凡曾观察暹罗（泰国）之生活者，皆知暹罗今日国势之强盛，胥由华人之功；盖华人以其智慧与血统，注入于暹罗民族，而后暹罗人民精神焕发，此乃公认之事实也。”<sup>②⑦</sup>

遍布于全球的客家人对侨居国之贡献，不胜枚举。然而，仅从上述不难看出，客家在华侨史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珍本同名《海录》两书 系分别由均为粤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的客属人士谢清高、杨炳南所著。谢著《海录》为全一函共二册。杨著《海录》仅一册。前者对东南亚见闻记述颇详，后者系对前者做某些补充。清同治庚午年（1870年），友蟬精舍重刻谢著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卤洋外大西洋，自谢清高始。”关于谢的身世，杨在其著述的序中写道：“余乡有谢清高者，少敏异，从贾人走海南岛，遇风覆其舟，拯于番舶，遂随贩焉。每岁遍历海中诸国，所至辄习其言语，记其岛屿、阨塞、风俗、物产，十四年而后返粤，自古浮海者所未有也。后盲于目，不能复自生产，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因之谢著《海录》记述的东南亚见闻，皆系谢本人“所身历，且意

存传信，故所述绝无夸诞。”

纵观谢著《海录》全书，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孙叔林所说：“它不仅翔实地记载了东南亚各国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而且介绍了当地的物产及风土人情，堪称研究东南亚国家历史、地理、人文科学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尤其为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忠实地记载了华人、尤其是客家人在东南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付出的艰辛和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书中关于广东梅县籍客家侨领罗芳伯的记述即是生动一例。因此，可以说，谢清高及其《海录》是中国人研究东南亚之先驱。”<sup>⑧</sup>由是可见，客家不仅在华侨史中地位重要，而且在华侨史研究中同样起“开荒牛”的作用。

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海内、外华人，均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因而包括一脉相承的客家文化在内的华夏文化亦被称为炎黄文化。之所以说客家文化与华夏文化、炎黄文化一脉相承，是因为它的“根”在古黄河中、下游流域，即人们常说的中原地区。

客家先民及其后裔，系炎黄子孙，系出中原，这是有史可查的。

赖熙熙编著《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有如下记载：

丁氏条云：“丁氏，系出齐太公子伋，谥丁公，其后子孙因以丁为姓，启族中原，支分派衍，……及宋南渡，其族遂有移殖于大江之南，渐次而入赣、入闽、入粤者，丰

顺丁中丞 日昌，即 吾粤丁姓之族望也。”

方氏条云：“方氏，系出黄帝第十一子，因征蚩尤有功，封于方山以邑为姓，……唐时有方姓昆弟六人，均赐进士，是以有六桂堂之名，其父因平黄巢有功，受赏殊勋，后由河南迁于闽之莆田。明末时，有方盛者为惠州都指挥，其高叔祖即方孝儒也。盛后没于任，有二子，寄籍于归善，今惠州方姓，均其裔云。至粤中各属方姓，俱属六桂堂衍自莆田者，渊源皆同一派也。”

申氏条云：“申氏 系出姜姓炎帝后 有申吕封于申，以国为氏，……传及后世，宗族渡江南徙，拓殖江西，后更度岭入粤。”

卓氏条云：“卓氏，系出楚大夫卓滑之后，……晋五胡之乱 中原望族相率而奔粤 有卓祚者 为建安刺史 后因家焉。至唐乾符初，卓隐之为莆田令，后人因之居于莆田。宋绍兴间，卓庠字在周迁连城，传十三世正之长子仲兴迁长乐，仲兴之十世孙有廷茂者迁东莞，卓族多其裔也。”<sup>②</sup>

类上述之例 不 一一列举。凡此说明 客家系出中原，同为炎黄子孙，是确凿无疑的。因历史上的由北而南迁徙及囿于定居地闽、粤、赣边山区的闭塞环境，客家人最终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鲜明的移民及山区居民的色彩。然而，尽管如此，它与源于中原的华夏文化、炎黄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还是很明显的。

客家文化极具代表性的，是客家的语言和山歌。<sup>③</sup>

关于客家语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在其所著《种族的品性》一书中写道：“关于客家人的情形 第一件可注意的事，便是他们的方言，他们说的实在是一种官话，和四围非客家人的话很不相同，但是很像现在中州河南的话。客家人原出南方，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sup>③①</sup>

河南地处古黄河道中、下游地区，即人们所称的中原，系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的方言，曾是中国古代官方语言的基础，因之保留古语较多，客家语言与此基本相同。

例如，客家话称“我的”为“吾”（uga），称“你的”为“若”（guia），称“他”为“其”（gi），称“他的”为“厥”，（gie），称“太阳”为“日”，称“姐姐”为“姊”，称“公猪”为“豕”称“吃”为“食”，称“漂亮”为“嬾”（tzan），称“胖”为“肥”（pi），称“频频”为“数数”（soe—soe），称“好了”为“好矣”，称“很好”为“肆好”或“已好”，等等。“这些辞语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统文学所常用的词汇。”<sup>③②</sup>

又如，客家方言与河南方言相同的词汇：“逢”曰“碰”；谓“束缚甚紧”为“绷紧”，谓“折”为“扞”，谓“茎”为“梗”，谓“兄”为“哥”，谓“筷子”为“箸筴”，谓“合算”为“滑算”，等等。

至于客家山歌，“它既保留了客家祖居地——中原的文化神韵，又有华南文化的异彩。”<sup>③③</sup>

### 一首古老的客家山歌唱道：

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  
生也缠来死也缠，生死缠在你身边；  
阿哥死哩变大树，妹死变藤又来缠。

这首山歌，在客家山歌中是非常典型的，客家地区的男女老幼，几乎无人不知晓。整首客家山歌不著一个“爱”字，而用山间特有的树、藤相缠的“缠”描写和渲染执著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典雅含蓄，意味蕴藉。这种赋而兼比、兴而兼比、赋而兼兴的表现技巧，均衍自《诗经》以来中国诗作中的传统艺术手法。从这首山歌中还可看出，客家山歌是一种格律化的民歌，七字一句，句的格式整齐固定，与旧体诗七言绝句相似，第一、二、四句押韵，第一句可仄起而不用韵。它的平仄较少限制，以唱时顺口为主。它是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艰苦的迁徙过程中，眼有所见，心有所感，情有所发而逐步形成的。

有人说脍炙人口的广西僮族的山歌剧《刘三姐》是源于粤东的刘三妹的故事。<sup>③④</sup>在客家地区流传了二三百年的刘三妹对答罗秀才的客家山歌，其中一首唱道：

河边洗衣刘三妹，借问阿哥哪里来？  
自古山歌松（从）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sup>③⑤</sup>

刘三妹的故事，从粤东传到粤中肇庆一带，继而传到粤西，最后在广西僮族落户，刘三妹也变成“刘三姐”。《刘三姐》的歌词和曲调，与客家山歌均颇相似，尤其是歌词，许多采自古老的客家山歌。

在此必须提及的是，古老的客家山歌中，兴国山歌是最著名的之一。

兴国，系赣南客家人聚居地。兴国客家山歌，相传源于唐代木客（伐木工人）山歌。据《潯水志林》记载：“兴国上洛山（今该县隆坪乡境内）有木客，尝就民间饮酒赋诗：‘沽酒君莫醉，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宋苏东坡《题上洛山》中亦有“山中木客解吟诗”之句。

兴国客家山歌的特点，是运用比兴、夸张、对比、谐音、反衬、重叠等多种手法，即景生情，因事起兴，即兴而歌。内容根据需要，可长可短，音调因情而异，或慷慨激昂，或委婉低回。表现形式有对花、猜花、锁歌、盘歌、赞歌、捡脚跟、丢观音、绣搭裪等。<sup>③④</sup>

兴国客家山歌具有浓厚的赣南山区地方色彩，内容十分丰富，题材广泛多样，其中情歌较多。旧社会，劳动人民用以倾诉婚姻不能自主的苦衷，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精神，如“竹子赚笋连竹鞭，哥哥和妹心相连；任你雷轰暴雨打，烧唔掉来冲唔断”等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客家山歌被赋予革命的内容，成为宣传工农革命的有力工具，如一首题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